

慢慢地被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消解，“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①。

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经抗日战争一役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日本打败，反而经此刺激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李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包括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活动。对这一举动，国外的媒体大多能够给以正面的解读和评价。但也有不少媒体表达了一种担心，认为在这个中日关系高度敏感的时期，中国的高调纪念活动会在继钓鱼岛争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20 周年之后，将中国国民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绪推向新的高潮，由此或许会给中日两国关系的处理和东亚局势的稳定带来一些隐患。

其实，在东亚，中国的对日民族主义思潮是与日本的对华民族主义思潮互为条件、互相推动的，而且二者有着共同的根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背景。

历史原因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由来已久，它是与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危亡形势相伴兴起的。在诸多列强中，对中华民族为害最深、最重的是日本。120 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以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而告失败，被迫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高达 2 亿两。84 年前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此后不到 6 年，日本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经过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援助下终于赢得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首次在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获得彻底胜利，但是战争造成的伤害也深深渗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由此，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结下了一个难解的结。

20 世纪 70 年代，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日本普通民众相区隔，大度地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此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顺畅，经历了一段将近 20 年的蜜月期。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提供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无偿资金援助，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93 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和 199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50 周年纪念日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村山谈话”，虽然是迟到多年的道歉和反省，但还是受到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肯定和赞

^① 顾颉刚《旅行后的悲哀》，《独立评论》1935 年 7 月 29 日第 111 号。

许。然而,进入21世纪初叶,日本笼罩在异常的气氛中,在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上奉行历史修正主义态度;在领土问题上频频与邻国发生争端。不但伤害了中日国民之间的感情,而且一再刺痛那根民族主义的神经。中日之间的关系因此急转直下,日本与其他邻国间的不信任也日渐凸显。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和斑斑劣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导致日本部分国民不但缺乏负罪感,反而对中国、韩国等历史上的受害国产生了严重的逆反情绪,这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重新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越孤立,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越高涨,政坛就越是右倾化。

在历史清算问题上,人们经常将日本与德国作比较,个中原委就连日本人也心知肚明。2015年5月14日,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虽然同为二战战败国,但日本对战争历史教育的充分程度远逊于德国。近半数德国人认为其学校对纳粹德国对战争历史进行了充分教育,而在日本认为学校对战争历史教育比较充分的只占13%;68%的德国人知道纽伦堡审判的内容(其中认可审判的占92%),相比之下只有33%的日本人知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其中认可审判的占68%)。正确历史教育的缺失,导致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出现明显偏差。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性质,46%的受访日本人认为既是“侵略战争”,也是“自卫战争”,而认识到是“侵略战争”的只有三成。同时,65%的日本民众承认,日本对那场战争的清算努力“仍不充分”。正像人们所观察的那样,德国的纳粹战犯至今仍然在被通缉之中,日本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却在战后出任了日本首相;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著名的“华沙下跪”闻名世界,而2001年至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6次参拜了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在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德国总统能够代表国民发表讲话感谢苏联对纳粹政权的奋勇斗争,而日本首相仍在质疑“侵略”的定义。日本右翼势力不但影响着国内的教科书审定,而且无理要求美国出版商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内容,逼迫国内的公办博物馆撤下有关日本战争暴行的展品,甚至还在固执地为“神风特攻队”举办“申遗”活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日本对战争历史教育和认识的偏差,导致其与受害邻国战后和解不力。前述调查显示,94%的德国人认为德国与受害邻国实现了和解,其中认为“很好地”实现了和解的有39%;相比之下,只有46%的日本人认为日本与受害邻国实现了和解,认为“很好地”实现了和解的日本人仅有1%。^①

当然,对日本的历史清算不彻底,作为占领国的美国负有无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与德国不同,“战后的日本宪法,是在美国人的监督和直接干预下,依从原帝国宪法的修改手续制定的,增加了新的内容,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等,却未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彻底的一个方面,给战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增加了困难。然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新保守主义者仍认为现在是到了把它‘还给’美国人自己的时候了”^②。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当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也包庇、利用了部分日本战犯,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同样是不可饶恕的。

现实背景

现实地看,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此消彼长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是近年来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思潮重现高涨的直接原因。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思潮总体上是理性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前已述及,自二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都有为数不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至今网络上仍然充斥着“秋后算账”的言论。日本右翼势力从来就不认为当年的战争失利是中华民族等被侵略民族顽强抵抗

^① 《民调显示日本战争历史教育远逊于德国》,《文汇报》2015年4月15日。

^② 邓聿文《日本为何对历史反省不彻底?》,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909,2013年8月12日。

的结果，而是输给了美国和苏联。由此潜伏的互不服气的矛盾心态在中国比较贫弱时并不明显。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时还有数亿计的贫困人口，而日本已崛起为亚洲经济的领头羊，成为世界经济巨人。所以，彼时的日本基于国内发展和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需求，还能够向中国的建设慷慨地施以援手，输出资本并开展经济合作。但是，此后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正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二十年，泡沫破裂，停滞不前。进入 21 世纪，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发生逆转。2010 年中国 GDP 总规模超越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二，日本退居世界第三，这一变化给日本人的心理带来强烈冲击。特别是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军事实力显著增强，日本极右势力开始坐不住了，大有“狼来了”的感觉，惶惶不可终日。2015 年 5 月 14 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的一篇文章道出了这些极右势力的认识“纵观历史，国家间的实力水平发生重大变化，即‘强者变弱、弱者变强’时，后来居上的弱者具有向走向衰弱的强者发起全面‘进攻’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不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逻辑吗？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中日关系的变化正像当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指出的那样，经历了 20 世纪下半期的战略防御、21 世纪初期的战略相持之后，如今已经进入了“人民战争”最后的反攻阶段。^① 形势紧迫，日本不得不防。

在中日两国国力此消彼长的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局势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日本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当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美关系改善推动的结果。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但是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开始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重返亚太、遏制中国是美国奉行的新战略，而日本正好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一枚重要棋子，由此不可能不会影响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同时，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中日之间爆发冲突不可避免，届时美国对日本的庇护是否牢靠也成疑问。因而，日本既要与美国修改防卫条约，将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又要挣脱来自美国的羁绊，修改“和平宪法”，为自卫队“解禁”，争取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还要与那些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串通一气，试图遥相呼应，构建起一个对华包围圈。

安倍政府在致力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所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明显违背了日本的战后和平承诺。许多国家已经毫不客气地指出其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并引发了中国、韩国这些历史上的日本“加害国”的强烈谴责、高度警惕和对日民族主义思潮的全面高涨。在此形势下，为得到日本国民的拥护，日本政府不惜奉行历史修正主义路线，千方百计为其以往的战争行为作辩解，为其危险的右倾政策寻找理论支撑，同时似乎找到了一条屡试不爽的途径，那就是将国内矛盾向国外转移，煽动起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与中国、韩国等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形成“一较高下”的态势。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20 多年的经济发展低迷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冲击就是自信下滑，而中国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则进一步动摇了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认同。与此同时，政治领导力的赤字和首相的频繁更替以及 2011 年的地震海啸核电站泄漏三重灾难，更加剧了日本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日本社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心。日本急切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动力来凝聚民心，重塑信心恢复国际地位，而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复兴日本’的一个有用的手段。”于是就有了所谓“安倍经济学”。但是“安倍的‘日本复兴’战略并不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试图把经济繁荣同保家卫国以及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混合体。可能在他看来单纯用恢复经济的方式，不足以调动日本国民的积极性和凝聚力，而必须将发展经济战略同国家安全需要结合才能激发日本复兴的动力”。^② 日本也有学者分析道：战后日本“虽然表面上被封锁了，但是日本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在战后 60 年也没有枯竭。回顾我国历史，在国家危机之时，尊皇精神和爱国心就会兴起，超越危机。现在日本的危机状况，通过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日本传统精神的复兴，必然能够度过”^①。但是，

^① 参见《日媒：中国对日“人民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环球时报》2015 年 5 月 16 日。

^② 张云《日本需要“向前看”的民族主义》，《联合早报》2013 年 6 月 7 日。

如此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不正在将日本拖出国际社会之外吗？

综上所述，时下中国对日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可以说是日本民族主义助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对曾经饱受日本侵略者伤害的中国人民而言，日本还欠一个公开、正式的道歉。“球在日本方面”，日本只有正确对待历史、尊重历史，像德国那样对自己以往的“加害史”做出彻底的清算，同时认清形势、摆正心态，与自己的邻国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获得受害国人民的谅解，中日两国针对彼此的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逐渐自然消解。中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高调举行纪念活动，不是为了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更不是为了刺激日本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激发全民“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同时向全世界昭示中国当年在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费正清说过，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在笔者看来，只有那些看重历史的民族才是充满智慧的民族，才是拥有未来的民族。我们虽然在经济规模上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在科技实力、国民素质诸方面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谈论民族主义思潮时切切不可忘记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及其成因

孙立祥

日德两国同是当年的法西斯侵略国、战败国，共同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两国政要对这段相同的侵略历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导致两国与邻国一个摩擦不断、一个和解共赢的重要原因。值此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就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及其成因展开探讨，当有裨益。

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

1. 战争认识问题

德国的总统、总理、议长等政界要人，不但坦率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频频道歉、真诚谢罪，表现出应有的政治远见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其中，既有将德国战败日（5月8日）定为“德国人民解放日”的国会决议，也有赫尔佐克总统在波兰华沙起义50周年纪念仪式上“请求宽恕”的谢罪讲话^①；既有勃兰特和科尔两位总理分别在波兰和以色列犹太人纪念碑前一跪混恩仇的惊世之举，也有魏茨泽克总统和默克尔总理规劝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DJ002）。

^① 《“购岛”闹剧促日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参考消息》2012年9月12日。

^② 黄永祥等《不要忘记德国》，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第307页。